



舒芜

“文革”后不久，我到丹东参加了一个高校写作课青年教师讲习班。开幕式上宣读与会者及所在学校名单，其中不乏名牌大学，大家静静地听。当念到我来自曲阜师院时，出乎意料地台下突然响起了掌声，我听见邻座有人说“孔子家乡的大学也来了”，仿佛给这个讲习班长了脸。这气氛表现了大家从批孔中解放出来的兴奋，从一个方面为孔子也是为传统文化正了名、平了反，写作也正在摆脱“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陋习和“客里空”的文风，这也正是这次讲习班的主题。

这次讲习班请了一些名家做报告，其中有舒芜先生。他讲的题目是《不应该

【学界往事】

□黄清源

舒芜改稿

舒芜先生对整理稿的修改，恰好是与“不应该那么写”密切结合的一个示范性实例，是“应该这么写”的形象教材。

那么写》。这个题目四十多年前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用过。鲁迅文中说：学习者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才会明白“应该这么写”。怎么知道不应该那么写呢？“最好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舒芜紧扣这一思路加以具体化。他从作家手稿的修改谈起，联系历代诗文修改增删的例子，说明“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那么写”。报告博引古今，材料生动，给我印象很深。

当时我还兼任我校主办的一个语文教学期刊的编辑。我觉得舒芜这个报告深入浅出、很切实际，回校后我想把它发在我们刊物上。为尊重报告人，我把记录稿整理后寄给舒芜先生审核。

舒芜先生很快就寄回了修改稿，还附有短笺：“拙讲承记录润色，居然像一点样子，使我非常感谢。遵命稍加校订，随函附呈，乞检核，为荷！”口气之谦逊，哪像一位名家给一个小刊物编辑的信函？“拙讲”还特意写成了小字。所谓“润色”，我心里清楚。听舒芜报告时我记录粗略，整理时就感到为难，有的地方需极力回忆，实在想不清楚只好按我的理解来“整理”。为文意贯通，有时又加了点自己的话。这种“润色”是不得已而

为之。我打开修改稿，看到舒芜先生近百处的改动增删，感受到了学者的认真态度。舒芜曾长期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当时是我国社会人文顶尖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的编审。我觉得，这位老编辑对整理稿的修改，实际上给我提供了一个“不应该那么写”和“应该怎样写”的直观教材。

举个例子。舒芜的报告中说了这么件事：鲁迅悼念五烈士的诗，其中两句是“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后写《为了忘却的纪念》引录了这首诗，但这两句各改了一个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整理稿分析说：“‘忍看’，便准确地写出了他无法抑制的悲愤感情；‘刀丛’，则进一步表现出了当时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气氛。”舒芜紧接着加了一句，“也表现出作者反抗白色恐怖的勇气”。看到这里，我心中一亮：加得好！增添的这句突现了鲁迅无所畏惧的品格，诠释不但更加全面，而且突出了重点。

再举一个改动较大的例子。该例说明汉语的一个特点，相连的两句重点往往在下句。

先看整理稿：“有一年发大水，淹死了一些人。施材局（施舍棺材的）门口有副对联：上联出自《论语》，

下联出自《孟子》：‘逝者如斯夫，掩之诚是也’。意思是死者是死了，掩埋就是了。这里含着死者已死、活着的人还要生活下去之意。但是如果把它调过来呢？‘掩之诚是也，逝者如斯夫’，意味发生了变化，透露了低沉、悲郁的伤感。”

再看舒芜的修改稿：“有一个地方河流险急，经常淹死人，于是设立了施舍棺材的施材局。门口有副对联，上联出自《论语》下联出自《孟子》：‘逝者如斯夫，掩之诚是也’。这对联很切合，也很工稳，着重在下联，赞美了施材局的行善功德。有人说，改一改就更好。怎样改呢？他只是把上下两联颠倒过来：‘掩之诚是也，逝者如斯夫’，这就不一样了。‘逝者如斯夫’成了下联，也就成了重点，重在对那些不幸淹死者的哀悼，使全副对联很有感情，令人咏叹不尽。”

一经对照，便看出了整理稿的缺陷和修改稿的准确到位。

鲁迅先生说要从作家的修改稿中学习写作，“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舒芜先生对整理稿的修改，恰好是与“不应该那么写”密切结合的一个示范性实例，是“应该这么写”的形象教材。

（本文作者原为曲阜师大中文系教授）

父亲方荣翔留给我的家书

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存折”，是父亲留给我的无价之宝，也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亲随山东省京剧团赴日进行文化交流演出。临行之前，查体时发现他患有严重肺炎，常常痰中带血，加之1974年又曾出现过心肌梗塞，此行怎不令人担忧？而父亲却不以为意，照旧做他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琢磨自己的艺术，并过问剧团演出的准备。全家人常提醒他注意休息，父亲却说：这次访日演出非同小可，咱们带给日本人民的不仅仅是京剧艺术，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一些朋友也劝父亲保重身体，有位观众说：“我从一份材料中得知，日本将方先生誉为‘国宝’，您这国宝可要为我们保重啊！”父亲耸肩一笑：“言重了，而且，人家越称咱们是宝，咱们不更应将宝献给观众吗？”

送父亲离济的那天晚上，父亲在火车站台上嘱咐我：“我和你妈商量好了，争取在我完成访日演出回国之日，你和小徐（我爱人）旅行结婚，欢迎你俩去北京接我归来，那时你将是两件喜事……”

“为啥是两喜？”我不解地问。

“第一件喜事是你将要完成终身大事，第二就是你爸爸从日本完成任务凯旋呀。”父亲面带喜悦开玩笑地说。将进车厢时，他微笑着告诉我：“唔，对了，你结婚我也没有什



么礼物送给你，临走之前放在你桌子上，算是一个纪念吧！”

回到家中，我发现一个粉红色软皮精装笔记本静静地躺在我的桌子上。我想：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没有结婚的只剩下我一个，另外，兄弟姐妹六人中就数我和父亲相处时间长，父亲一定会重视我的婚礼的。凭我的直觉，笔记本里一定夹着父亲留给我的存折，存款至少是五位数。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本子，哎，怎么啥也没有啊？我急切地翻动着每一页，生怕存折被漏掉。然而，翻遍整个笔记本连同塑料皮套的夹层也掏了个遍，连半张纸片也没找到，只是在第一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

立民：

你要走向婚后的世道了，当然我祝你幸福，但负担也随之加重了，比咱们在一起生活时可艰苦得多。我和你妈妈都希望你们商量好，

搞好计划生育，晚两年再要孩子，这就要采取良好的避孕措施。我们亲身的体验是，婚后先适应地过几年舒服日子，等经济、精力都缓上来再要孩子也不晚……

另一件是我极不放心的事情，就是遇事要和小徐多商量，不允许与她争吵、打骂，甚至动手打人（犯法）、开口骂人，这都不允许。你脾气不大正常，也有些是我做父亲的一些恶习影响了你。父亲不好之处，你要批判，决不可接受或照办，一生不允许向自己的爱人（更包括任何人）开口骂、举手打以及小心眼儿，要爱自己的爱人，疼她，宽人严己，一生做好这件事是不容易的，但一定要做好。

父亲 荣翔

1982年9月1日去日本前此刻，我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存折”，是父亲留给我的无价之宝，也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本文作者为二级编剧）

也许不少人会认为，以前的“富二代”与当下的“富二代”没啥两样，无非是些坐享其成或胸无大志之类。不过细读一些史料，才感觉过去的“富二代”中还真有不少抱负远大之人，如清末民初的一些“富二代”，他们视金钱如粪土，不少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或投身革命，或去追求崇高的理想。记忆中，彭湃、殷夫、赵一曼、毛泽东、周恩来、吴焕先、刘格平、向警予、艾青、罗广斌、林觉民、叶剑英等等，都是富裕或比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中共早期的很多党员都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但他们最终还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上了革命之路，因为他们信仰公平和正义，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革命先驱彭湃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位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人出身

【若有所思】

他们也是“富二代”

□刘天放

工商地主家庭，却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被家人骂为“逆子”。他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怕他“败家”，亲兄弟们分产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手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在那样一个昏暗的年代，彭湃就有如此气魄和胸怀，难怪日后他成为农民的杰出领袖，即使被捕后也依旧怀着这样的信念慷慨赴死。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同样令人震撼，黄花岗烈士中多是“富二代”。那么多“富二代”都投身革命，一方面证明清朝统治已丧失人心，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年轻“富二代”的远见卓识，还可窥见有追求的“富二代”在当时绝非风毛麟角。他们飞蛾扑火般的决绝，选择革命和敢于赴死的勇气，就是当时黑暗中国的火种。回望辛亥，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强邻虎视，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与日俱增。凡有志之士，无不主张推翻专制腐败的政权，革除暴政，通过民主共和拯救中国。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3月29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及海外留学生在黄兴的带领下强取两广总督署，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终因寡不敌众，革命失败。事后革命党人潘达微冒险收殓烈士遗骸72具，并将其葬于广州东郊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死难者，数倍于此）。据史料载，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其中9人是留日学生。这些19世纪的年轻海归，均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为民族的自由和复兴，放弃锦衣玉食，割舍万丈柔情，用自己的生命去敲响苦难深重、满目疮痍的中国之黎明钟声！

黄花岗烈士中的留日学生林觉民当年才24岁，他以“亡大清者，必此辈也”的气魄，气宇轩昂地以死报国。还有年仅25岁的“富二代”海归方声洞，他起义前留言给父亲和妻子：“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几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还有曾谋刺摄政王、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的“炸弹大王”、年仅24岁的喻伦……

“富二代”大体分两类，一类子承父业、兴家富族，或坐享其成，或庸碌一生，人生如行尸走肉者也不稀奇；另一类不甘寂寞和沉沦，以信仰和理想为导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不能强求“富二代”都先知先觉，或都那么高尚，但无论什么年代，有崇高理想和追求之人更能活出人的尊严和精彩。而庸碌无为的有钱人，不管他们是富几代，都无法与有理想和信念的富几代相媲美。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像有一句话很流行：“先辈们出国带回的是救国良药，而今人出国带回的是彩电和冰箱。”到了21世纪，无论出国之人带回的是“洋奶粉”还是“马桶盖”，似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要有点家国情怀，有一点崇高的追求，别总想着自己的那点私利。

辛亥革命早已远去，可民族复兴的大业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些“富二代”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内争自由，外求独立，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成为他们自愿选择的人生归宿。他们这样做，自然少不了他们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不时仰望他们，不仅让当下之人总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那个“小”，到了时刻警示我们，一定要学会区分善恶，千万不要忘记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而什么又是不应该做的，哪怕自己再富有。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